

傳播內容之定量分析與定質分析

閻沁恒

一、緒言

內容分析為大眾傳播學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其開始與大眾傳播研究發生關係是美國學者對報紙內容的分類分析，以後逐漸擴充對各種語言傳播（verbal Communication）內容如電視、廣播、電影、書籍、雜誌、信函、演講、傳單、日記、談話的研究，甚至非語言的傳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內容如音樂、姿勢、地圖、藝術品等也包括在內。應用之廣與著綱之豐，足可證明此一方法已成為大眾傳播研究中值得討論的一個重要課題（註一）。

班爾遜（Bernard Berelson）在所著「傳播研究的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為內容分析所下的定義是：

內容分析為客觀、系統及定量的敘述明顯傳播內容的一種研究方法。（註二）

這一定義雖已為學者們認為是所能見到的比較滿意的一個，但是至少其中有一半是引起爭論的。所謂定量的敘述是否應該排斥所有定質的敘述？所謂明顯的傳播內容是否應該忽略隱藏在一般文句後面的真正意圖？在喬治（Alexander L. George）所著「宣傳分析」（Propaganda Analysis）一書中提出許多反面的意見和事實，證明定質的分析仍然有效，而用一般所知的意義作為對傳播內容的解釋，未必能够隨處皆適（註三）。本文現就諸家之說，作一比較性的討論，並且將所想到的一些問題求得初步的答案。

首先就社會科學研究的趨勢而言，是盡量朝科學一途發展，所以用數字計算不但普遍通用，而且流爲一種時尚，言科學而無定量之法，似已失去了憑藉。如果圖表和統計數字可代表社會科學的一切方面，那當然是最理想的，不過目前還未見到此種可能性。因此強調定量方法並沒有錯，唯排斥定質的方法則就有商榷之必要。學者或把定質的方法併入定量方法之內，或避而不談，或言辭曖昧，未有所指，實均非宜。是非之辨即使難定於一時，但絕不會不辨而明，面對問題，甚至所貢獻的僅是一涓一滴，亦有其助益。

定量的分析與定質的分析所指的內容爲何？學者已有討論，現擬將主要的兩派對立意見作一比較與說明，尋出其同異之點，加以分析。所謂質量二途，只是方法運用上彼此強調的程度有差異，並非根本上判若兩物，故要作絕對的劃分幾爲不可能。

在進行研究當中，從質抑從量的方式常是不易截然劃分的。所謂定質的分析有時亦採用含有量的意識的字彙如「多於」，「少於」，「增加」，「減少」等；所謂定量的分析在取捨資料，形成假設，確定類目，下定結論之時，若無主觀的意識爲助，如何能够達成。

定質與定量的分析方法，既然在根本上同出一源，運用上又難分涇渭，與其讓它們「藕斷絲連」不如乾脆「重歸舊好」，合而不分。在作內容分析的研究時，或偏重於質，或偏重於量，或不偏不倚，雙途並進，端視何者適宜，何者有效，而不必拘泥於某種形式，一意排斥其餘。

二、柏勒遜對定量與定質內容分析的看法

柏勒遜在「傳播研究的內容分析」一書中有專文一篇，敘述他對定質內容分析的廣泛意見（註四），歸納而言，分為以下七點：

(1) 很多「定質」分析為準定量分析。定質與定量分析之間並無嚴格的區分，如同定量分析包括一些質的類目頻數 (frequencies) 一樣，定質分析亦常有粗簡的定量表達。此一方式雖不太明顯，但總是一般類目範圍內的頻數敘述，譬如使用「重複地」，「極少地」，「時常」，「常常」，「強調」等量的辭句描述傳播內容即是。因為不是以數字表示，不說百分之七十三屬於某一類目，而說某一類目受到重視；不說某一類目早期發生頻數為百分之二十三，後期為百分之四十一，而說它「已有增加」或「急劇的增加」。以上二種表達的方式都是定量的，不過是一個較另一個準確而已。這樣並非意指較高的準確性是絕對的必須，有的問題不管是百分之六十或七十，只知它是高於某一個準確而已。故重要之點為這一區別不屬於定量與非定量的問題，而是不同方式的定量表示。

(2) 「定質」分析常決定於某一內容的出現—未出現（而非相關的頻數）：以某一意識而論，這是量化的三個特例，量的計算單位只有零和一兩個，高於一的則對內容的解釋無任何重要性。譬如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一九二二年對達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的分析提到他在父親的計文上兩次提到逝世的時間，像這類事情，一次出現已經足夠，出現兩次反而視為違反常例，要研究其中是否有什麼隱祕。在政治方面，運用非頻數 (nonfrequency) 的方法，從歷史及傳播兩方面去發現情報資料的事例，在喬治的「宣傳分析」一書中就是屢見不鮮。引證戈貝爾 (Goebbels) 使用「反恐怖」(Counter-terror) 一辭，據以推演納粹正策畫進行其「猶太計劃」；引用著名廣播評論家富利茲 (Hans Fritzs-

che) 對潛艇勝利的謹慎評論以及未提及德國海上的新武器，藉以預料納粹是在挫喪公衆對海戰勝利所寄託的希望。這種分析的方式，如果沒有明白和一定的推論方法，則與閱讀加上研判的傳統史學方法並無二致。

(三)「定質」分析限於小型或不完整的選樣：所謂定質的研究，除了在選樣方面所分析的內容太小，不嚴密和定型與準確的計算有別而外，其主要部份仍是屬於定量的分析。關於小型選樣的事例，如果在某一年美國、法國和英國的影片產量總數是一百部，從事定質的分析可能是選美國影片五部，法國影片二部以及英國影片二部作比較的分析研究，但事實上並非說僅有這九部影片與研究主題有關，而其餘的影片中民主也無就沒有所需要的資料。關於不嚴密的選樣問題，如就「民主」一辭的演變作一歷史性的檢討，所依據的選樣範圍亦不同，資料無疑的是部份的或片斷的，故量化的精確度不會完整，現有的內容僅可提供出一個概括的趨勢。

(四)「定質」分析通常較定量分析包涵較高的比率非內容本身 (non-content) 的敘述：「定質」分析常常把傳播內容視作跳板而集中於發訊人 (communicator) 的意向或對閱聽人的效果，而定量分析則集中於內容的直接記述，精力全部放在計數的程序上。「定質」分析對意向或效果的推論當作分析過程中的主要部份，而定量分析的敘述則常是遵循分析的程序。此一差異並非在實質方面，而是從考察有關的論著中得出。例如兩方面都研究同一的種族關係的問題，定量的分析研究雜誌小說中對少數民族的處理，則由內容的敘述組成；「定質」分析研究美國宣傳家的宣傳技術，則由敘述發訊人的意向和動機以及閱聽人的反應組成。

(五)「定質」分析比較重視內容對深入現象的反映而非內容的本身：這一區別亦非在實質方面，而

是一歸納性的概況。定量分析所討論的是內容本身，如雜誌小說中怎樣處理少數民族問題？廣播評論員如何處理勞工問題？那家報紙在處理某一事件時最少有激情的意味？工商業性的期刊對政府的各種法令反應如何？這類問題的中心在集中於傳播內容對以上的問題是怎樣說法。「定質」分析的重點則就傳播內容討論事項的一個標示（*indicator*）（註五），分析政治家的宣傳意向，顯示其觀念或意識，故非為研究內容而研究，而是透過研究某一內容以達到另外的目的。內容只有暗示和反映之功，以及尋求在明顯意義之外是否有言外之意。但情況並非全如此，定量分析也有將內容的標示視作有暗示及反映作用的時候，如以雜誌內容如何反映一般態度和興趣為題作定量的研究即是。相反的也有「定質」的研究是以內容本身為主的，如本國和敵國的教科書中所載有關雙方戰爭一事的比較研究即是（註六）。不過二者之間的一般關係仍是值得注意的。

(六)「定質」分析較定量分析少用定型的分類（*formalized Categorization*）：定量分析的推論是根據比較固定的公式，故必須有清晰與完整的分類，因為可靠的計數分析非以此為基礎不可。由此可知定量分析較「定質」分析在分類上更要有具體和系統的範圍與組織。當然這也不是二者間必然的或實質的差別。在定量分析中經過初期的事先測驗和修正後，其典型的程序就是須作初步的分類、解釋和組織，然後予以精確的分析；在「定質」分析中不但初步的分類是在分析進行中始能得到，並且依據文意隨時有所不同，因此通常是較無系統及較不準確的。但相反的也可說是比較明智而適切的方法，因為缺少嚴格的分類制度，內容有較敏銳和單獨的解說，並且以一般的分類廣泛的應用到各種問題上。定量分析是以現有的問題決定其分類，而「定質」分析的分類則是隨處摭拾，不能充分的加以利用甚至無法作適

當的查對。

(七)「定質」分析較定量分析採用較複雜的主題。」「定質」分析的基本內容單位 (the basic content unit of analysis) 較定量分析為複雜。定量分析所要求的可靠性使它不得不對複雜之主題加以限制，而設法將複雜的資料分成若干部份，俾作可靠的測量。「定質」分析的測量單位多是採取其大者，以使整體的外貌和形態包含有所要求的意義。除了根據特定的反應，以作推論而外，亦根據全部的反應（其中當然有省略部份）作綜合的解釋，如以奧斯汀 (Jane Austen) 四部主要小說的內容來重新塑造其個性（註七）便是。這就是以多種小說的全部作為分析的單元，並以此為據去作解釋。「定質」分析即趨向於這種方式，把內容視作一個全部的形態而予以分析。

以上所述，就是柏勒遜所持關於定質分析與定量分析運用於傳播內容分析時的主要相似與相異之點。他認為定質分析不是以計量而不準確的測量方式出現，就是以閱讀加上判斷內容含義的傳統方式出現。為避免名辭方面的混淆起見，最好以「內容分析」指以符號 (symbols) 數量的差異為基礎的研究，而用「內容評斷」 (content assessment) 一辭指對內容的鑑別不以符號出現數量的多寡為基礎的非定量研究。如果以上的敘述是合理的話，那麼定量分析「只重頻數」 (mere frequencies) 與定質分析「只重意義」 (mere meanings) 二種無稽的劃分就不能成立了。(註八)

三、喬治對於定量與定質分析的認識

「宣傳分析」一書的作者喬治根據他對宣傳與政治行為之預測以及對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宣傳的研究

所獲之心得，寫成「內容分析中定量和定質的研究方向」(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Content Analysis)一文（註九），收入蒲爾所編「內容分析的趨向」一書中。他對於定量分析與定質分析的不同之處有具體性的詮誦，並且對於定質分析的技術與原理詳加闡述。喬治固不否認定量方法的可靠性，但也強調了定質方法的有效性。他認為柏勒遜的書雖然是多數學人所承認的系統之作，但定質分析究為何物？定量與定質分析二者之間的區分究竟在何處？雖有敘述，仍不免有含混之處。了解柏勒遜的立論之後，再對照喬治與他相反的見解，將可獲得一更明確的認識。以下即擇述其文要旨，以為介紹。

(1) 定質分析與定量分析真正的區別：

(1) 定質分析是對傳播資料的初步研讀，以期形成假設 (hypothesis) 與發現新的關係；而非系統性的內容分析，以求證其假設。

(2) 定質分析是一觀察內容性質的主觀程序 (impressionistic procedure)，而非一求得精確，客觀與可靠事實的系統性程序。

(3) 定質分析有一分法的特質 (dichotomous attributes)，此即預備屬於或不屬於某一事物之特質；而非可由準確測量（真正量的變數）得到的特質或順序（指連續性之事物）（註十）。

(4) 定質分析為內容之觀察與譯訊之判斷的一個彈性程序；而非一項硬性的程序。

(1) 頻數與非頻數的內容標示 (frequency and nonfrequency content indicators)…前述四點特點

勝利的道
也，前途好
了，評論、考證

雖很重要，但不擬在此作進一步的討論。現在僅就傳播內容方面探討研究者對於非內容變數所作的推論。如前所述，定量分析注重在內容特性的頻數，以此頻數作為研究之對象。定質分析不論由屬於內容的推論或不屬於內容的推論，它的形成不一定依靠其特性的頻數。推論式的假設或對於關係的陳述，可能是由傳播體內某一特殊的內容特性或某內容特徵的出現—未出現的因素所促成。因此利用非頻數之內容標示以作推論就被認定是非量的或非統計的內容分析。相反的，如果是頻數內容的標示，則認定內容特性出現的次數與所作的推論相關性甚為密切。

「海上新威嚴」 假定定量或統計的內容分析只能選擇語文中適合作硬性測量的部份，或者是非頻數分析僅作出現與未出現二者選一的工作，均非確論。事實上不論是頻數或非頻數的分析，都有機會用到二分法，如單字計算方式的內容分析，就是某一單字或符號是否在一句、一段、一篇中出現，故並非只有非頻數的分析才注重二分的或質的特性，而是頻數分析處理時常找出頻數的分佈作為推論的根據；非頻數分析則僅以出現與否作推論的基礎。譬如以定量研究來說，史達林的名字在「真理報」上出現的次數突然減少，頻數的分析家認為這是他的繼任人企圖將此一已死去的獨裁者予以貶降或漸與之脫離關係；另以非頻數分析家來說，根據同一事例，他發現史達林的繼承人在公開演說中應該提到他的名字時有意的予以省略，因而作了類似的推論。前者是注重在某一時期內對史達林名字的頻數分佈，後者則是某一場合史達林的名字出現與否。雖然二者都以觀察出現與未出現為目標，但一個採用較大的譯訊單元（coding units），一個則採用單一的譯訊單元。

(1) 非頻數研究之本質與獨賴頻數或定量內容分析之缺點：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於二次大戰時所作的宣傳分析，其中三個例子甚有助於說明，茲簡述如下：

(1) 德軍在列寧格勒慘敗之後，國內士氣消沉，對納粹政府的不滿之聲時有所聞，處此情況，戈貝爾在一次對全國的演說提到「反恐怖」一辭，從文意及當時的情勢而觀，聯邦傳播委員會認定戈貝爾已有反猶太的腹案。根據「反恐怖」一辭在某一文意下出現以作推論，不論此一辭是否當時再重複出現或在其他宣傳資料中出現，研判者只注意它在某一特定的情況下出現的意義（註十一）。

(2) 在另一事例中，聯邦傳播委員會判斷納粹宣傳部在間接衝淡德人對潛艇戰的希望，這一推論也是根據非頻數的內容標示。著名廣播評論家富利茲在討論德國最近一次潛艇勝利時說：「……我們將不會那麼天真，把此次勝利的事實當作對未來的冥想……」注意到這段談話，分析專家不去操心這樣的主題在富利茲談話中出現的頻數怎樣，或者是現在比以前常出現的關於德國潛艇宣傳資料是多還是少，甚至只出現一次也就很有用處。如果是頻數（定量）的研究，第一是否可精確的把握富利茲之言而建立內容類目，第二，因為最多這種資料之出現也不超過數次，分析專家在面對量的結果時，很可能說那並非一重要課題，或列入其他類目中。換以言之，如果富利茲之言包括在頻數標示之外，就會失去它的重要性。

(3) 第三個事例，也頗多相似。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政府後，德國宣傳方面對此事相當注意，並且亦為墨索里尼重組擁軸心的政府而深感欣慰。幾天之後，聯邦傳播委員會發現在少數幾家納粹的報紙上很嚴肅的談到一個問題，如：「戰事尚不能因墨索里尼之成就而獲勝，目前他在政府結構上的改變亦不能當作未來成功的保證。」研判人員利用這一課題作非頻數的內容標示，即發現了它的重要性。如果視作普通的頻數標示，定量的研究便可能錯過。聯邦傳播委員會的研究人員從此一話題的出現，進而推斷德國宣傳部是沖淡民眾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復蘇後的希望。這一推論，日後在戈貝爾的日記中也證明正確不誤。

(註十三)。

(四) 定量內容分析於應用中發生的困難：無論從宣傳傳播的性質或推斷發訊人的蓄意行為，最少須盡一部份力量發現新的假設或修訂舊的假設；用系統的定量分析以求證推論性的假設常是困難，不實際和不必要的；而且非定量的（非頻數的）內容標示常較定量（頻數）的標示適當和有效。

(1) 宣傳傳播常謀達成不同的目標和方略，故分析家只能就一個或少數有關事項形成推論，因而他必須留心各種流通的傳播中何者與其目標與智略有關係，但達到這一判斷又非用定量分析所可達成。如果把內容作成一有順序的提要，則其中每一項目未必皆與講話人意識有關。

另外關於統計性的內容分析必須要符合「系統性」的條件，即將要研究的內容按照分

成的類目去分析，無關的內容自然不包括在內。但決定何者為相關的內容則甚為不易。在研究一項大量的傳播內容之際，即使已選定有關的內容類目，仍難免包括一些某一問題之外的材料。有時把無關的內容包括在分析範圍之內是一種人力的浪費，甚至妨礙形成有用的推論或導至完全錯誤的推論。如能有一個清晰的假設，將無關之內容包括在內的危險性就會減少，但是這在宣傳分析中仍然是不易做到，同時於宣傳分析之外的其他同類研究中情形也略仿，如拉斯威爾等人在「瑞第」計劃中（RADIR Project）用大量的符號研究當作政治價值、態度、觀念的索引，也認為政治傳播的科學研究由於沒有相關的原理及假設，致大受掣肘（註十四）。

總之，甚少符號行為的原理及一般假設可用嚴格的定量內容分析以求證，故學者只顧蒐集大量的內容材料，而沒有清晰的假設做引導以發現新關係及新假設。這類研究耗時，浪費且通常收穫不豐，尤其研究工作必須假之助手時，更不能充分的修訂其類目及了解全盤的資料。

(2) 說話者的策略改變問題：宣傳者的策略任何時候都可能改變，故推論說話人對某事的意向時，宣傳分析者不容易決定一組內容類目能適合於說話人所有可能的傳播策略之改變，這種改變甚至可能發生於正在計算之時。如果改變未曾發見，則推論的量的計算價值可能失去。

宣傳分析家和精神病理家對於說話者的傳播企圖和策略之改變都十分敏感。對於說話

人策略的敏感與否，不僅對宣傳分析有助，對內容分析亦然。

(3) 有關傳播範疇的擴大：宣傳的另一特性是形成推論之際，傳播的範疇可能正在擴充。換言之，宣傳分析家常發現必須趕上和自己問題有關的傳播流量 (the flow of communication)，在未看到他要分析的全部傳播內容之前，必須先擬定臨時性的假設及內容類目，若有新的資料，宣傳分析家就要修訂他的假設和類目。因為有時限的關係，又須根據不完整的材料作成臨時性的報告，這種情況常使沒有機會採用系統性量的內容敘述。定量內容分析在工作開始之前，已知要找的答案為何，宣傳分析家則可能尚在未知之數，因為他不能確定現有的資料是否已經足夠，有時最新的資料對問題的推論異常重要。

有時研究內容以外的非內容資料也引起宣傳分析家的注意，因而幫助他形成更明確的假設。所以要重複的研讀原有的宣傳資料和吸收非原定研究內容而對宣傳推論有關的間接資料。「再的重複研讀原料是定質宣傳分析的一個特點，但並非輕視定量的分析方法。在研判宣傳內容及可能擴充內容的範圍時，宣傳分析家常不願採用耗費時間的量的敘述方法。

(4) 傳播結構的性質：宣傳分析的程序深受個別宣傳傳播結構不同的影響，德國某報登出戈貝爾發表的一篇專文和希特勒的一篇演說詞，二者的結構是不同的，二者和德國電台的新聞廣播結構又有差異。宣傳分析家在盡量避免將不同結構的宣傳傳播粗率的匯集在一起，分析任何一項單獨的文字傳播如演說詞、專文、新聞、社評等也同樣有結構特性的問題。一項傳播的意向和效果常不僅包含着敘述中的明顯內容及主題，並且也有各部份敘述之間的

結構關係，因為有效的宣傳常對內容的順序、文意和銜接作一種非常的安排。如莎士比亞在所著「愷撒大帝」中描寫安東尼（Mark Anthony）首先對聽眾稱讚愷撒之才能，然後漸漸轉入正題，以使聽眾為之感動，即為一例。

統計性的內容分析通常假定每一單獨的類目在推論上的重要性是相等的，同樣的每一主題和敘述在推論上的重要性須依靠精確的頻數，而宣傳分析却發現類目全體或個別間的某種關係對於推論宣傳者的策略甚為重要。此說並非完全否定頻數的計算對於宣傳分析的價值，統計單字、術語，常用句及口號等可以顯示宣傳之重點、技術及意向，但這種數字對內容的含意並沒有提示，所以只有研究者事先瞭解在語言習慣中其含意、地位和重要性，數字對於研究工作才有價值。

✓ 宣傳分析家不必單注意類目的頻數，而是注重宣傳內容的主題和重要性，不管它出現的次數多寡，而只問出現沒有以及結構的與組織的關係。這種方法的運用，實際上就難於符合系統性與定量性的要求。

(五) 非頻數方法的若干特性及特殊問題：前面已提到非頻數方法的一些特性，現在再加以引伸和說明，並且將其中一些特殊的問題提出討論：

(1) 內容類目之選擇：若干定量研究之技術上的要求是以較大的數目與選樣的大小決定類目的選擇，致忽略了出現次數較少的符號或主題，或者合併在一個較廣泛的類目中。宣傳分析注重在某一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所發生之事，如果忽略了非頻數或低頻數的內容標示，就會

失去有價值的推論機會。

(2) 強調有效性 (validity)：非頻數的方法較定量內容分析注意說話人的意向，同時在有效性與可靠性之間也比較重視前者，因為採用低頻數或僅有一次的出現為推論的根據時，是不能有任何不切實際的論點包括在內。

意向的判斷，不僅是根據字典的解釋及語文的規則，而且還包含相關的、情況的、行為的以及語言學的觀點。這種方法與「明顯的」內容分析截然不同。明顯的內容是定量分析者所強調的（註十六），對於字句的含意僅以表面的標準如通常，習慣與一般的意義為準。如此雖可增加客觀性和可靠性，但說話人的字句如非用作一般字句的解釋，則其結果的有效性就產生差誤。

所謂文字行為的含意 (the behavioral context of words) 就是指傳播所要達到的目的；所謂情況的含意 (the situational context of the communication) 就是考慮是誰說的，說給誰聽，在何種環境之下，以及說話者和聽眾間的關係，同時也考慮時、地及有關事項。這種明顯的內容，即使是從事定量分析有時也不能採用，因為他必須知道說話者的所指的意義 (intended meaning)。（註十七）

(3) 紋述與推論的密切關係：如果一人對另一人說：「你這老傢伙，」對象若是一個嬰兒，那是一種親蜜語；如是一位老年人，其意義便大不相同。紋述和推論階段的分辨不清，很容易有產生偏見的危險，所以必須把資料作多次和廣泛的閱讀以防此弊。

(4) 非頻數的內容標示並非不能用定量的方法，只是比較困難而已。如要決定一篇演說詞中某一主題的出現對政策的改變有無影響，可以從同一人或身份相似者過去同樣的事例中作推斷的依據，但是過去沒有的話，那就不能用定量方法。

四、定量分析與定質分析的比較

定量分析與定質分析都是以傳播的內容作研究的對象，在實際研究工作中很難作絕對的劃分，這是柏勒遜和喬治都同意的一點。不過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方面強調的重點有所分別。從方法的觀點而論，定量分析是比較有系統性和精確性，可以具體說明研究設計及進行的過程，使同一方法可以重複運用；從目的的觀點看，定質分析的有效性和時宜性較高，因為方法較有伸縮性，嚴格的研究程序對它沒有任何約束，故可爭取時效。

(一) 選樣的大小與完整：定量分析是以頻數分佈的狀況作為研究的基礎，類目的統計及重要性，悉以頻數的多寡為準，故選樣的範圍 (universe) 較廣，選樣的數量也較大。因為靠統計的數量作推論之根據，故選樣不完整，數字所代表的意義就會殘缺不全。定質分析有時也有比較粗簡的數量觀念，但一般的情形還是以出現—未出現（即出現次數在零與一之間）作內容的標示，而以一篇演說詞或一篇專文作選樣的單元，故選樣的規模甚小，也不考慮完整與不完整。

(二) 傳播內容的功能：定量分析對於傳播的內容最為倚重，研究分析的整個過程全神貫注在內容的本身，舉凡所得的統計數字與分析所得的結論，全部不脫離研究範圍內的傳播內容，如果就名實而論，

最適於當內容分析之名。定質分析是以傳播內容作跳板，達到求得內容以外的意義。內容是分析的工具，而非分析的主體，許多宣傳的分析其結論皆與內容本身無關，而是在推知宣傳者的動機和策略。

(三)系統性、可靠性與有效性：定量分析對於研究步驟的設計完全遵守嚴密的規則，方法既已決定，不能憑主觀之見輕言改變。定量分析既注重方法的系統性，分析所得結果的可靠性亦較高，但爲了堅持方法的正確，難免犧牲一些有效性。以方法觀點而論，定質分析的系統性極微，因爲研究者得因時宜之便，隨時修改或更換已決定使用的方法，這種不固定的情形有時是難以說明的。定質分析是以其有效性而自豪，這就是說經過分析之後，可以得到所預期的結果，但亦非絕對的。定量和定質分析同樣都可能全部或部份失去其有效性，只是程度有別而已。

(四)方法的伸縮性：定量分析是一種機械式的方法，所以在選樣，分類和解釋統計的結果時，比較深入性和相關性的因素和敘述很少能顧慮到，而且把質的材料予以量化，不能使內容中的字句、段落、文氣等完全適合所定的準尺（scale），勉強的分類和不當的省略，都會引起不良的後果（註十八）。定質分析是低頻數或非頻數的研究，不必考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可能性，因時、因地、因人之異而可作適當的調整和改變，對於發訊人的策略，相關資料的採用以及最新資料的吸收，均可自由運用，不受限制，故伸縮性高。

(五)傳播的結構：定量分析於確定類目之後，每一類的字句和段落便形成一獨立的單位，賦予量化的意義，傳播內容順序的安排，文意脈絡和互相的關係都不去注意，只從普通的和明顯的含意中去作解釋，同時發訊人的身份背景與表達的方式（包括採用何種大衆傳播媒介）對於內容的意義與效果之影響

如何，也爲無暇考慮的事。定質分析注重潛在的意義 (*latent or intended meaning*) 和傳播效果的分析，所以不同的發訊人和不同的傳播媒介常賦予傳播內容以不同的意義。注重傳播結構的特性，無疑的可增加內容分析的效果，但在方法上總是冒若干的危險，無經驗的初學者是不宜輕試的。

五、結論

總括以上所述，定量分析與定質分析各有其優點與缺點，在研究傳播內容時很難完全採取一種方法而絕對排斥另一種方法（註十九）。如果是從事一般傳播內容的分析，偏重於定量之法無疑的比較適宜；如果從事實傳內容的分析，偏重於定質之法比較方便。不過以大衆傳播方法論的立場而論，定量分析是比較更能符合科學研究的精神，所以凡是可以從事量化研究的題材，就不必去考慮走定質分析的路線。

誠如柏勒遜所言：『定量分析家應努力使其類目觸及重要而「豐富」的問題；另一方面，定質分析家不僅要憑其想像去發明和發展豐富的分析類目，並且應該更進一步負起充分與明白的說明其假設的責任。』（註二十）真正的知識不僅要說明「什麼是什麼」，而且要說明我們「如何知道它」。所以不是定量分析與定質分析方法上的分歧困擾我們，而是如何使這些方法能爲人所知，爲人所用而更待學者們的繼續努力。

註一：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〇年是內容分析方法的初步發展階段，中心地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一九三〇年代政治學家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用之於宣傳與民意的研究，社會學家拉查斯斐(Paul Lazarsfeld)

- F. Lazarsfeld) 言之於廣播研究，以及其對之於向聽者研究，這算是內容分析方法的奠基時期。
據「大輿報」，美國政府當時會廣泛地應用出法蘭西之外大眾傳播內容作各種的內容統計分析，
而伊士德（Ithiel De Sola Pool）著《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一書（一九五一年出版）中，將貝瑞爾森（Bernard Berelson）著《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一書（一九六四年再版）及波爾（Ithiel De Sola Pool）著
「內容分析」（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一書參照，亦可見出一脉承襲的方法演進梗概。
III. 現 Bernard Berelson,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2), P.18.
III.. Alexander L. George, *Propaganda Analysis*, (Evanston, Illinois and White Plains, New York,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1959), pp. 287.
III.. Bernard Berelson,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14-134.
III.. indicator
III.. Hornell Hart, "Changing Social Attitudes and Interests", in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McGrawHill, 1933), and Arthur Walworth, *School Histories at War: A Study of the Treatment of Our War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History Book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hose of Its Former Enem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0).
III.. Geoffrey Gorer, "The Myth in Jane Austen," *The American Imago*, 2, 1941, pp. 197-

204. *Sense and Sensibility, Pride and Prejudice*, Mansfield Park, Emma 埃米爾·富爾

羅米奧斯汀著。出《感統亦可觀測與量度》，因推測量度據是少數個案是量度事實。

註 八…蘇聯蘇聯民族主義「『』」，立派長壞壞。

註 九…蘇聯亞歷山大·葛羅夫「Alexander L. George, *Propaganda Analysis: A Study of Inferences Made from Nazi Propaganda in World War II* (Evanston, Ill., 1959), and "Prediction of Political Action by Means of Propaganda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 (1956), pp. 334-45.

註 十… 約翰·多爾溫 P. Cartwright,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Material", in Leon Festinger and Daniel Katz,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3), pp. 421-70.

註十一… Harold D. Lasswell, Daniel Lerner,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ymbol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38,指出蘇聯黨員「最能回答問題」，RADIO Project 誓言蘇聯民族主義「最能回答問題」，蘇聯黨員較複合起來的蘇聯「最能回答問題」，最好在擴散蘇聯民族主義。

註十二… 苏聯蘇聯民族主義「最能回答問題」，蘇聯民族主義。

註十三… Alexander L. Georg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Content Analysis, Pool eds, *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 pp. 12-14.

註十四… Lasswell, Lerner, and Pool,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ymbols*, p. 49.

註十五… 伊希爾·德·索拉·波爾 Ithiel De Sola Pool, *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 P. 221 註十六。

廿六.. 即其 Harold D. Lasswell 之說人。

廿七.. 當 Harold D. Lasswell and Dorwin P. Cartwright 二人。

廿八.. 例 Dorwin P. Cartwright,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Material," in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edited by Leon Festinger and Daniel Katz, (1953), and "Some Problems in Qualitative and Case Analysis", in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by William J. Goode and Paul K. Hatt, (1952).

廿九.. 同其 Paul R. Hoopes,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 in Three Argentine Dailies," *Journalism Quarterly*, Autumn, 1966, pp. 534-7, 例亦甚詳。此項研究甚為興起，即其標題甚為多樣。

三十.. Bernard Berelson,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33-4.